



太白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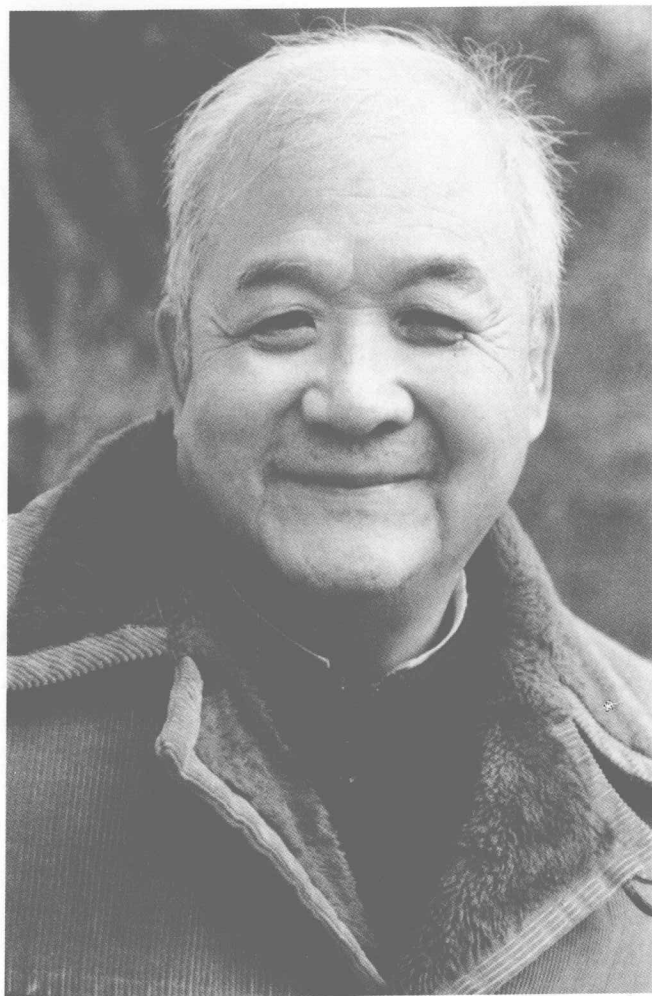
萧乾

尤利西斯（上）
第一卷
译作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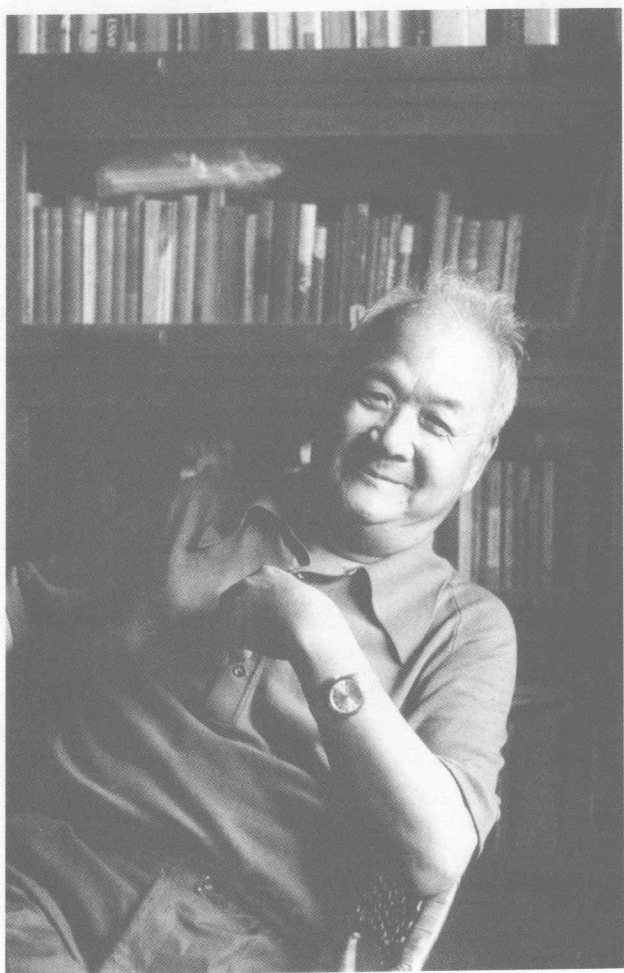
萧乾译作全集

第一卷

太白文艺出版社



□ 萧 乾



□ 萧乾在书房中



□ 萧乾、文洁若夫妇



James Joyce

□ 《尤利西斯》作者 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

萧乾译作全集

主 编

文洁若

出版说明

《萧乾译作全集》收入萧乾从事文学翻译活动近七十年来的全部翻译作品（英译汉），不包括1973—1979年萧乾参与集体翻译的《战争风云》、与张梦麟等人合译的《屠场》和与赵萝蕤等人合译的《猪年的棒球王》及个别短篇散文之作，未收新中国建立之前和以后的汉译英作品。全集按作品分别编为十卷，是一部较完备的萧乾翻译作品总集。

全集的编选工作，由萧乾夫人文洁若进行，陈华昌、黄道京协助工作，黄友文参与了有关工作。作品收入全集时，主编文洁若作了必要的内容订正、文字校勘，以保证全集的质量。

全集收入的作品，大多数都出版过单行本。这次收入全集，在版式、体例上均根据全集统一要求作了调整、变动，与原来有所不同。

全集的体例大略是：各卷中除作品之外，还有“本卷说明”和译本前言或序、跋，说明外国原作版

本和原作者的情况与作品翻译的情况等，以帮助读者阅读、理解作品。全集卷首，有文洁若撰写的“前言”，详细介绍萧乾在文学翻译方面的经历与成就。全集最后的附录部分，有“萧乾传略”、“萧乾生平年表”、“萧乾著译作品目录”，以使读者全面了解萧乾“为文学的一生”。

萧乾的翻译，向以“得体”、“传神”、“幽默”著称，其译作风格迥异于其他翻译名家，具有鲜明特色和独特魅力，其文学成就为世人所瞩目，堪称一代大家。

今年，是萧乾诞辰九十五周年。可以说，全集的出版是具有纪念意义的。广大读者在阅读萧乾译作的同时，不仅可以领略到原作的原汁原味风格、欣赏到传神译笔下的丰富精彩内容、陶醉于萧乾幽默而深刻的语言中，而且更能从中感受到萧乾——一代文化名人和杰出作家、翻译家、记者的人格魅力与文学神韵。这也是全集的学术文化价值所在。

限于时间以及水平和经验的不足，在编辑、注释及文字校勘方面，恐有粗疏错漏之处，还望广大读者、专家批评指正。

出版者
2005年1月

前 言

萧乾是作为著名作家和杰出记者闻名于世的。他的许多优秀的文学、新闻作品,早已广为流传,脍炙人口,在中国文学史和新闻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然而,这些只是萧乾毕生从事的文学活动和全部文化生涯的一部分。作为一名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和杰出的文学翻译家,萧乾翻译的文学、新闻作品更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国内外影响、感染、教育了整整几代人。可以说,萧乾在文学翻译上的成就是巨大的,他为中外文化交流和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而重要的贡献。这一点,是有目共睹和毋庸置疑的。

萧乾曾说:“我的副业是沟通土洋。”他把翻译看作副业,写作才是他的正业。实际上,他毕生在翻译方面做出的成绩绝不亚于创作。萧乾从事文学翻译工作达六十七年(1931年至1998年)之久。不论中译英还是英译中都游刃有余,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与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推动作用。

萧乾是个暮生儿,少小失怙,奋发图强,在人海中拼搏。四堂兄把他送进了崇实学校,让他从小学工读上到高中。四堂嫂安娜(美国人)是一位优秀的英语教师,在她的教导下,聪明好学的萧乾九岁时就像掌握母语般地通晓了英

文。这就为他日后从事翻译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萧乾的翻译经历

(一) 三十年代

1930年秋，萧乾迈入辅仁大学西语系门槛，靠教洋人中文来挣学费，他和美国青年安澜就是这么结识的。安澜读完大学，带上一笔钱，想先在地球上闯荡一番再进入社会。然而一到北京，他就迷上了这座东方古都，倾囊办起一份刊物，第一期叫作《支那简报》。在萧乾的建议下，自第二期起，改名《中国简报》。那时上海有个英文的《密勒氏评论周报》，办得很成功。安澜雄心勃勃地想办一份与之相媲美的刊物。为此，他还常向清华大学哲学系贺麟教授请教。

萧乾看罢第一期，告诉安澜，1919年以来，中国发生了一场“文艺复兴”，大批重要作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安澜立即邀萧乾作他的副手，还规定了二人的分工：萧乾负责文艺，他管其他方面。

目前珍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中国简报》(China in Brief)是一份英文周刊，创刊号发行于1931年6月1日，第八期则于7月29日与读者见面。它的宗旨是向关心中国社会、文化进展的英语世界“介绍现代中国文艺界的情势以及社会大众之趋向与其背景”。《中国简报》报头下面印着一行醒目的大字：“关于文学、社会、艺术动向的文摘周刊。”报纸发行人是美国人威廉·阿兰，文艺版主编是萧乾。

现存的《中国简报》一至八期，转载了鲁迅的《聪明人、傻子和奴才》、《野草》，郭沫若的《落叶》，茅盾的《野

蔷薇》、《从牯岭到东京》，郁达夫的《日记九种》、《创作之回顾》，沈从文的《阿丽丝中国游记》，徐志摩的《自剖》、《灰色的人生》（诗），闻一多的《洗衣歌》（诗），章衣萍的《从你走后》，还对这些名作一一作了粗浅的评介。除上述大家外，还译了一些《二月二来龙抬头》一类民间文艺作品，均出自萧乾之笔。

在第八期上，文艺版主编萧乾公布了专栏的蓝图：（一）每期介绍两位中国当代作家，“述其身世、性格、作风，选择其代表作（指短篇）”。准备陆续介绍蒋光慈、叶绍钧（圣陶）、张资平、周作人、谢冰心、丁玲、胡适、谢冰莹、苏曼殊、胡也频。（二）力求翻译介绍能够代表作者的文艺思想、作风特点、反映作者的生活背景的外国文学作品。（三）计划出以下专号：“文学革命号”、“革命文学号”、“中国新诗坛号”、“南国戏剧运动号”、“北平小剧院运动号”、“国故派与白话文学派之战”、“语丝与新月社、创造社之论战”、“汉译西洋文学书目”。

计划后面写道：“通过以上简略介绍使欧美读者对中国文坛有初步认识后，就开始刊登新文学的短篇作品。因为对象是对东方文坛茫然无知的读者，所以评论不求深刻、透辟。计划虽然大得惊人，但只要文坛同道襄助，我们并不视为畏途。”

这个计划大体上包括了新文学运动第一个 10 年间的成就。由此可见，萧乾这个《中国简报》文艺主编的眼界是广阔的。他 16 岁那年的夏季在北新书局当一名练习生，曾大量阅读我国现代文学作品。19 岁考上燕大国文专修班，受教于杨振声教授，对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有了基本知识。

20岁上大学一年级时，萧乾已开始帮助系主任雷德曼改同窗的卷子了，其实就是担任助教的工作。

可惜由于经费不足，《中国简报》夭折了，威廉·安澜带着一批刊物回美国去了。他对萧乾说，没想到中国之旅能取得这么大的成果，真是不虚此行。

《中国简报》是最早向世界介绍中国新文艺的一份刊物。至少在英语世界是如此。5年后，斯诺的《活的中国》才问世。

这份英文文艺周刊在当时旅居北平的西方读者当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辅仁大学西语系主任、爱尔兰裔美国神父雷德曼的鼓励下，萧乾将《王昭君》（郭沫若）、《艺术家》（熊佛西）和《湖上的悲剧》（田汉）等剧本译成英文，又用英文写了《棘心》（苏雪林）的书评，均发表在《辅仁学报》（Furen Magazine, 1932）上。

1933年萧乾转学到燕京大学，改读新闻系。教他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时正在编译一部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也就是《活的中国》。斯诺也看过《中国简报》，知道萧乾热衷于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现代文学，就邀萧乾参加《活的中国》的编选、翻译工作。结识萧乾之前，他已经在上海完成了这部集子的第一部分，其中收录了鲁迅的6篇小说（《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风筝》、《离婚》）和杂文《论“他妈的！”》，都是由姚莘农翻译的。斯诺请萧乾来翻译第二部分。其中共收短篇小说17篇，作者14人，即郭沫若（《十字架》）、茅盾（《自杀》、《泥泞》）、巴金（《狗》）、郁达夫（《紫藤与莺萝》）、丁玲（《冰》、《消息》）、柔石（《为奴隶的母亲》）、沈从文（《柏子》）、林语堂（《狗肉将军》）、田军（《第三枝枪》、《在“大连号”轮船上》）、

张天翼（《移行》）、沙汀（《法律外的航线》）、孙席珍（《阿娥》）、萧乾（《皈依》）、杨刚（《日记拾遗》）。

杨刚后来也参加了一部分工作。在斯诺的执意要求下，萧乾和杨刚各自提供了一篇作品。杨刚那篇《日记拾遗》（署名“佚名”）就是她根据自己所写的短篇小说《肉刑》译出的。

萧乾译完初稿后，通过斯诺的修改学会了“文字经济学”，也就是语言的简练明快，真切自然。萧乾可以说是借着帮助斯诺来编译《活的中国》，从而完成了自己在《中国简报》第八期中提出的计划。

埃德加·斯诺所编《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英文版于1936年由伦敦乔治·G·哈拉普有限公司出版。中文版于1983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由萧乾写了《斯诺与中国新文艺运动》作为代序。

30年代，萧乾翻译了美国戏剧家弗兰克·G·汤普金斯所作独幕剧《虚伪》，以及英国戏剧家奥利芬特所作独幕剧《梦的制作者》，中译均收入《小树叶》（商务印书馆1937年6月版）。据他本人回忆，“30年代当黄源在上海编老《译文》时，我倒凑过一阵子热闹。那时，我编的《大公报·文艺》与孟十还、靳以、黎烈文编的《作家》、《文丛》、《中流》和《译文》，都是在鲁迅影响和巴金支持下的‘联号’，有相互支援的默契。但我早已忘记都为老《译文》译过些什么了。”（《我的副业是沟通土洋》，收入《萧乾文学回忆录》，华艺出版社1992年4月版。）

(二) 四十年代

1939年10月，萧乾抵伦敦，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大公报》驻英特派记者，报道战时英伦。除了教书，他还积极参加伦敦笔会和国际笔会伦敦分会组织的活动，就中国现代文学频频发表演说。1941年5月9日，英国笔会在伦敦康伟厅为印度诗人泰戈尔举行追悼会。出席那次聚会并演讲的，有英国小说家爱·摩·福斯特。萧乾也应邀代表中国讲了话。他们二人就是这么结识的。同年，萧乾还应乔治·奥威尔的邀请在英国广播公司对印度广播中介绍中国文学的发展情况。

旅英7年间，萧乾在伦敦出版了以下五本深受英国读者喜爱的英文著作。

1. 《苦难时代的蚀刻》(Etching of A Tormented Age)，国际笔会丛刊，乔治·艾伦与恩德公司1942年3月初版；有瑞士苏黎士德译本，出版者：布尔—弗拉格社，1947年版。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1942年3月21日)上刊载了无署名书评《评〈苦难时代的蚀刻〉》，有左丹译文(见《萧乾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2. 《中国并非华夏》(China But Not Cathay)，引导出版社1942年10月初版，1944年1月第二次印刷。本书介绍中国历史、地理与抗日战争情况，强调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的局面。全书共15章。在出版者的要求下，由当时的驻英大使顾维钧写了序。他还选译了3篇自己的特写：《鲁西流民图》、《刘粹刚之死》和《一个爆破大队长的独白》。最后一

章谈战后中国的前景时，萧乾写道：“1842年以来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中西方相互了解的最大障碍。这一障碍拆除后，中国与她的西方民主阵营的友人之间合作的前途将是灿烂的。中国在抵御外敌上得到了国际上的帮助。任何头脑清醒的中国人都不会设想战后中国将关起门来与世隔绝。那样的蠢举既不符合我们的政治哲学，又完全违背中国的民族性格。战后的中国将以其物质及文化潜力，协同各国一道为创造一个更幸福、更清醒的世界而努力。”^①

跨入21世纪的今天来回顾当时刚过而立之年的萧乾的话，不得不承认其中有一定的预见性。

3. 《龙须与蓝图》(The Dragon Beards Versus Blueprints)，引导出版社1944年5月初版。本书的副标题是“战后文化的思考”。书中收有萧乾的两篇演讲。《关于机器的反思》是谈英国小说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对机械文明的反应的。《龙须与蓝图》作于伦敦华莱士图书馆，是由1942年作者在伦敦笔会中心举行的那次纪念弥尔顿《论言论自由》的简短发言扩充而成。另有两篇对印度的广播稿：《易卜生在中国》和《文学与大众》。

4. 《千弦琴》(A Harp With A Thousand Strings)，引导出版社1944年6月初版。这是一本从多棱角介绍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文选，长达五百余页。书前有阿瑟·魏礼写的一篇短序。他写道：“中国早期的《昭明文选》和《玉台新咏》确实曾把许多佚作或不经见之作保存了下来。”他认为萧乾这

^① 《萧乾文学回忆录》第164页，华艺出版社1992年版。此书收入《萧乾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本《千弦琴》的选编是做了件好事，并举书中的《孙中山伦敦遇难记》为例。序言最后说：“在中国，为人作序首先是友情的表示。此序虽不敢与中国古代那些优美的序言相比，但这也是发自友情的由衷之举。”全书共分6卷。第一卷是《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分作诗歌、散文、随笔、传记及书简等项。诗歌从湖畔诗人柯勒律治做了一场梦后所写的《忽必烈汗》，选到30年代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威廉·燕卜苏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赴内地时写的《南岳的秋天》。第二卷是《欧洲旅行家笔下的中国》，从13世纪的马可·波罗一直选到英国诗人奥斯伯特·斯特威尔民国初年访华时所写的《北京的声与色》。第三卷是《人物画廊》，从以东汉的焦仲卿为男主角的古诗《孔雀东南飞》、沈复的《浮生六记》，一直选到40年代项美丽所写的《宋氏三姐妹》。第四卷是中西文化交流。第五卷是有关中国文化及艺术的。哲学方面选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第六卷是民间文学，内分民歌、格言、儿歌等。

英国《观察家》报（1945年11月11日）上刊载了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书评《评萧乾编的〈千弦琴〉》，有左丹译文（见《萧乾研究资料》^①）。

5. 《吐丝者》（*Spinners of Silk*）是萧乾自选自译的散文小说集，乔治·艾伦与恩德公司，1944年初版，1945年第二次印刷；有瑞士苏黎士德译本，出版者：布尔—弗拉格社，1947年版。收有《雨夕》、《蚕》、《篱下》、《雁荡行》、《栗

^① 《萧乾研究资料》，鲍弄编，《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2月版。